

# 城市化：中國天主教會面臨的挑戰

田英傑著 陳愛潔譯

## 中國城市化的一般資料

本文的目的在於直接探討持續城市化過程為在中國的天主教會所引起的種種實際挑戰。本文並非關注城市化所產生的社會問題，例如：交通擠塞、擠迫的居住環境、空氣污染、低劣的建築計劃及質素等等。即使是統計數據和歷史過程，本文只提供最低限度的資料，可以有助於推斷出和理解教會所面臨種種挑戰的原因。

我們由基本的統計數字開始：中國正處於極

其迅速的城市化過程中。根據官方估計，在二零一二年底，中國大陸的城市人口為七億一千二萬或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二點六，超過農村人口。根據預測顯示，到二零三五年，接近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將居住在城市。

不過，由於當局採用不同的準則來計算城市人口，所以，中國在這方面的統計數字可能是誤導的。如果把逐年的數據比較，便出現很多矛盾之處。例如，比較中國統計局分別在一九九零年和一九九一年發表的《中國統計摘要》的數字，

其不一致之處顯然易見：一九九零年的摘要記錄城鎮人口爲五億七千四百九十四萬，超過農村人口的五億三千六百九十七萬；但一九九一年的摘要則記錄前者爲三億零一百九十一萬，後者爲八億四千一百四十二萬，並調整前幾年的百分比。原因何在？

要得到正確的人口統計數字並給「城市地區」下定義，確實是十分困難。因此，在幅員廣大的中國，是很難收集客觀數據的。此外，強烈的政治考慮可能阻止當局承認城市人口的百分比上升，因爲這要求給予他們比農村人口更多權益。唯有在完全廢除戶口制度之後，人民才可以自由遷居並獲得預期的平等待遇，然後才有更客觀的統計。

但是，不管統計數字是怎樣，城市化過程的歷史總是較爲客觀。中國當局一直意識到城鄉之間的明顯差距，可能導致國內出現對抗的現象。但是，他們的實際顧慮是要保持國家經濟的農業

基礎，作爲工業化的支援。中國一直是農業和畜牧業國家，自從一九五零年代後期，當局開始限制人們移居城市地區。

然而，由一九五零至一九六五年，城市人口穩步增長，而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即大躍進期間，更記錄得顯著上升。這是因爲當局致力於工業化。在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五年）期間，由於推行對農村的「下放」運動，城市人口增幅下跌。然而，在一九七八年底推出改革開放政策，強調經濟和外資，城市人口，尤其大城市的人口開始迅速增加。

### 移民勞工面對的困難

面對越來越多農村人口移居大城市的現象，中國當局採取兩項措施：控制移居流量，並藉著在農村地區發展城市而減少移居。這個主意要給農村人口提供職業和城市住宅，使他們無須移居已經過於擠迫的城市。

就移居而論，外地民工人數在本世紀初期增加至超過二億人。他們遭受公然壓榨和侵犯，不僅長時間辛苦工作，而且薪酬低微、工作不穩定、被人拖欠薪金；其他的傷害更包括：不安全的工作及居住環境、缺乏社會保障的利益和協助、合約被否認、被排斥於公共醫療外、子女受教育的機會很低、過高的收費和罰款、受到城市居民和官員歧視等等。

當局公佈規則，根據《勞動契約法》（2007年）和《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2007年），讓民工享有一些權利。但事實上，壓榨和隨之而來的投訴仍然持續。此外，隨著二零零八年發生全球金融風暴，據稱有二千萬民工下崗回鄉。因此，中國當局爲了避免罪案、社會動盪及集體示威增加，關注爲返鄉者找工作。

由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六年，城市人口顯著上升，是一連串因素的結果。其中一項因素是大量過剩的民工由農村移居城市地區。另一項是當局

於一九八四年決定放寬把某地區歸類爲「城市」的準則。在農村地區發展新城市的政策持續，而人們由農村移居這些城市。他們在當地獲得住宅、工作及其他方便的設施。因此，城鎮人口大幅上升。在一九八零年代中期，人口統計學家預期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比例相若。這主要是由於小型和中型的城市增加，而不是擴展現存的大城市。

事實上，在一九八五年，連同上海、北京、天津和瀋陽等超級城市，中國的廿二座人口最多的城市共有四千七百五十萬人，佔中國城市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二。

至於人口達到至少十萬人的城市，其數目亦由一九七六年的二百座增加至一九八六年的三百四十二座。在二零零五年，中國有二百八十六座城市，其中大多數的人口約爲一百萬，而上海和北京均在人口最多的城市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麥肯錫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如果目前的

趨勢持續，到了二零三零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將達到十億。中國的城市將增添三億五千萬人，超過現時美國的總人口。到了二零二五年，中國將有二百二十一座城市的人口達到一百多萬人（歐洲現時有三十五座城市的人口達一百萬），而有二十三座城市有超過五百萬人。然而，中國城市的擴展將對地方和國家領導造成巨大挑戰。到二零二五年，中國的城市人口會增加至稍為超過三億五千萬人，其中超過二億四千萬人將是移居者。這增長將意味產生主要的壓力點。」

## 教會面臨的挑戰

從中國城市化過程的現況來看，以下幾項問題均是教會面臨的主要挑戰。

第一，要考慮民工的情況。民工的人數眾多，並且按照最近有關他們的職業背景的調查顯示，百分之三十四點二是農民，百分之卅六點七是學生，其中已婚人士比獨身人士多（百分之五

十二點七對百份之四十六點二），他們當然也包括天主教徒。

因此，城市教會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尋找和接觸他們，好能介紹他們加入地方教會團體，並防止他們失去信仰。那麼，找到他們之後，必須透過教理講授、宗教著作和聖事的施行，給他們提供穩固的基督徒指導。

透過接觸這些教友，整個民工團體可以成為地方教會努力福傳的特有對象。地方教會團體可以協助他們克服在適應新生活時遇到的困難，支持他們獲得公平待遇而不是壓榨，儘管這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並給予他們的子女獲得學校教育的機會。有關方面亦應該特別關注來自其他地方的大學生，因為他們懷有開放的態度。

在移居北京、上海、深圳和廣州等大城市的人也包括教友，他們來自擁有歷史悠久和根深蒂固的天主教傳統的省份（例如：河北、福建，以及浙江（尤其溫州）等地區）。他們成群結隊，並

且住在封閉的、緊密的團體（以氏族關係、相熟和共同利益為基礎）。他們傾向於在生活的各方面互相幫助，包括宗教。他們甚至從原居地邀請神父來協助和牧養他們。對這些團體來說，他們面臨的挑戰就是克服誘惑，即企圖保持一種封閉的「聚居區」思想和行爲，只照顧自己，不接觸和服務地方天主教團體。

第二，由新城市發展而產生的種種挑戰。這些挑戰不但要幫助外來教友適應新的生活方式，還要興建新的建造物，例如聚會地方、小聖堂或彌撒中心，並使他們在一個較為世界性的環境中團結。

人們應該支持這些新城市作為興建新聖堂和新中心的地點，克服情感的趨向，正如在過去一樣，傾向於回舊村落興建聖堂，因為有一個危險，就是這些村落遲早被人遺棄。此外，城市的聖堂應建立資訊中心和聚會地方，讓移居者可以得到資訊和結識別人。

對教會來說，城市化過程帶來的整體挑戰，包括在中國的新舊城市，就是尋找更適合於城市環境和有效的新福傳方法。由於在中國的福傳方法是傳統的，並與農村環境有關，這挑戰變得十分迫切和富有意義。首先，城市生活要求思想上的改變，尤其在聖職人員當中，就是克服「狹隘的態度」，即獨立工作，好像是「自己堂區或地區的國王」。

司鐸需要學習採納行使權威的新方法，與主教、與其他司鐸、修女和教友領袖緊密合作和計劃，在他們中間不劃分地區，而是劃分服務和功能。共同的服務，例如領袖訓練、教理講授、學生及青年培育計劃、婚前課程等，最好在城市層面推行。日常的牧民職責，例如施行聖事和關社工作，尤其是家庭、病人和窮人等，就應留給彌撒中心或聖堂。

教友面臨另一項挑戰，就是盡力滿足人們的需要。團結一致、分享、勤力履行自己的職責，

以及謙遜地履行愛德服務，都是基督徒見證的有效方法。個人的聯繫應得到優先考慮，因為正是透過教友的這些接觸（由於在城市中人與人的距離縮短，所以更容易接觸），很多人將被吸引認識天主教信仰。除特別慶典外，人們選擇小團體多於大團體，但團體之間應保持聯絡和合作。

城市產生個人主義態度和孤立。因此，為教會的另一項挑戰，就是在教友當中，以及在教友與其他人之間增加文化溝通，不但透過個人接觸，也透過刊物、著作和傳媒。互聯網在此尤其有用。由於城市人口的教育程度一般比農村的高，有關方面應努力準備和出版更加合適的作品（教會新聞和資訊期刊、書籍、視聽工具、錄影帶、電影等），其目的是向非基督徒，尤其是知識份子，表達基督徒信仰。在城市環境下，並在流動的社會中，似乎十分需要有更多教會的聯誼會和善會，以及活動中心，讓教友及其朋友能夠在適合的環境中度過他們的閒暇時間。

## 結語

城市化的確可能給宗教產生負面影響，因為大城市使人變得更自我中心和匿名，還有提供無數的物質誘惑，享受安逸的生活。然而，它同時可以變成一個更好的環境來傳播福音、宣揚基督徒信仰和建立見證的團體。我們必須謹記，初期教會主要在城市的團體中形成，而「外教人」（pagans）意指居住在「異邦」（拉丁文是 *paganus*，解作「村落」。）的人。因此，城市環境不一定對教會的成長有害，卻可能是讓好種子生長的肥沃土地。

□